

试论五原誓师的历史意义

刘 曼 容

1926年9月17日,正当南方北伐军兵围武昌、鏖战江西之际,北方冯玉祥国民军重新崛起,在绥远五原举行庄严的誓师,组成国民军联军,宣布接受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五原誓师是国民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对当时北伐战争和全国大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五原誓师是国民军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是国民军重新崛起的标志,也是国民军正式加入国民革命行列,成为国民革命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的标志。

1924年北京政变后至1925年底,国民军急剧膨胀,拥有数十万大军,占据北京、察哈尔、绥远、热河、直隶、河南、陕西、甘肃及山东一部分的广大地区,成为全国政治军事舞台上风云一时的强大军事集团。但在1926年上半年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国民军连遭重创,一败河南、山东,二败华北,三撤平、津,至8月下旬再败南口,数十万大军分崩离析。石友三、韩复榘等部投诚于山西军阀阎锡山。西撤“各部队几乎都已不成为有组织的部队”^①,东零西散,有的一团只剩2、3百人,有的一旅只余4、5百人,重武器丢失殆尽,合国民军一、二、三、五军,“尚有5、6万之众”^②。加以塞外天寒,粮食奇缺,官兵饥寒交迫,军心涣散,纪律废弛,“简直成了土崩瓦解的局面”^③,国民军“生命危乎殆矣”^④。

此时,大败之余的北方国民军急需富有感召力的将领收拾残局重振旗鼓,进军长江流域的南方北伐军也迫切需要国民军能从北方出兵策应,夹击北洋军阀,加速北伐战争的胜利。鉴于这种军事形势,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约请于右任和翻译马文彦去莫斯科,敦请冯玉祥回国率师参加北伐。

冯玉祥早于1926年4月,在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的不利形势下,飘然下野,赴苏考察,以“增长些见识学问,回来之后,再同大家一块儿好好地奋斗。”^⑤赴苏途中,他在库伦与鲍罗廷、徐谦等相遇,多次长谈“如何救民救国及党之重要”,商讨“国民军国民党合作事”^⑥,并在徐谦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

冯在苏考察期间,会见了一些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地参观访问,“深受世界革命空气之薰染”^⑦。他感慨地说,苏联“共产党的英勇无畏、高昂士气和自觉地意识到对全人类所负的责任,这使我十分钦佩”。“红军的训练方法极其有效”,“红军的教育原则是史无前例的。”^⑧回首以往,他痛感自己的短处是“只顾目前,无远大眼光”,“偏重军事,

无政治办法”，因之“本军团体主义不明，组织不良，决难幸存”^⑨。从而深刻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为行动中心的党的组织不可”^⑩。必须注意：“（一）真正之党。

（二）军队与民众合作。（三）党之良好组织，尤重在宣传主义。”^⑪同时，冯与驻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蔡和森、刘伯坚多次会面交谈，使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冯玉祥思想“进步甚大”^⑫，决心令国民军全体官兵加入国民党。6月间，他派刘骥、李鸣钟为全权代表由莫斯科到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接洽国民军入党手续及共同革命计划。不久达成了协议。稍后，冯被任命为国民军的国民党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

基于上述变化的冯玉祥，已奠定了回国组织国民军联军参加北伐的思想基础，乃欣然接受李大钊的恳请，于1926年8月离莫斯科回国，同行者有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福林和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等。

9月15日，冯玉祥一行到达五原。濒于绝境的国民军官兵听说主帅归来，纷纷从四面八方汇集五原。9月16日，冯发表回国宣言，郑重宣告：“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⑬。9月17日，冯玉祥召集在五原诸将领会议，议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冯被推举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同日，举行誓师大会，冯宣誓就职；同时公布国民军联军全体将士加入中国国民党，他代表全军宣誓：“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⑭五原誓师后，冯玉祥立即重新整顿部队。

首先，组成了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鹿钟麟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部长，刘伯坚为付部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其他各部、处也都任命了负责人。同时聘请乌斯曼诺夫等为总司令部政治军事顾问，任命史可轩为总司令部警卫师师长。

其次，整编部队。冯重新任命各军军长：一军张之江，二军邓宝珊，三军徐永昌，五军方振武，六军弓富魁。他将零散的部队归并或补充起来，并将整编多余的军官交与宋哲元编为暂编第一师，预备补充新兵，从事训练。同时，他着手收集失散的部队。冯与刘伯坚等专程去包头，号召原投向晋军的石友三、韩复榘等部队参加国民革命。石、韩承认错误，先后率队来归。沿途散失流亡的官兵知五原誓师的消息也陆续携枪归队。

第三，严肃军纪。冯通令全军注重纪律，颁发“禁令三条”：“严禁官兵，私入民宅商号”；“严禁官兵进入‘娼寮酒馆及戏院’”；“官兵无事，不准外出，如士兵必须外出者，需有官长带领。”^⑮接着，又颁布“行军禁令五条”：“一、严禁割放民间青苗。二、严禁强拉民间牲畜。三、严禁打掠民间牛羊鸡猪。四、严禁无故放枪。五、严禁私夺友军枪支马匹。”^⑯为切实执行这些禁令，总司令部派员密查，各师旅组织百名左右的执法官切实维持，一遇不法行为，即行严办，军纪迅速恢复。

第四，制定全军战略方针。五原誓师后，李大钊根据1926年9月20日《中央局报告》精神，在给冯玉祥的密件中，建议国民军联军出宁夏，取潼关，而后会师北伐，并密告奉直兵力及驻兵地点等军事情报和重要政治消息，以助他作出决定。冯及其将领经反复研究，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10月初，挥师援陕。11月即解西安之围，占领陕西。

五原誓师后，“经此一番振作，使形（行）将消灭的国民军”^⑰，重新崛起于西北。

五原誓师不仅是国民军从溃败到重新崛起的转折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国民军性质发生变

化的转折点。冯及其国民军将士由原来没有鲜明的政治主张，转为公开信仰新三民主义，揭起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旗帜；由原来只倾向进步，进一步发展为全军公开加入国民党，并要求共产党帮助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由原来只限于不扰民，进一步发展为扶助农工，力求武力与民众结合。这些是区别于军阀部队的显著标志，它说明国民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从北洋军阀分化出来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行列。

为使国民军联军革命化，五原誓师后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立即进行下述工作：

首先，成立了国民党国民军联军最高特别党部。9月27日，在五原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成立了最高特别党部，选出方振武、刘伯坚、弓富魁、石敬亭等11人为执行委员，冯玉祥、徐谦、于右任、刘骥、史可轩5人为监察委员。9月30日，举行了阅兵和授旗礼。冯玉祥接受了国民党国民军最高特别党部授予的党旗。

其次，建立部队政治工作。冯玉祥于9月26日、27日和10月19日先后三次发出电令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军将领对所部官兵详细说明三民主义、国民党、救国救民、取消不平等条约等问题之要义。他自己每天集合各部讲话，一班班亲自考察。他还要求部队“对于联合民众之事，必须痛下功夫……务使民众与军队十分融洽，痛痒相关。”^⑧他还通令全军将士把写有“军队须是为人民的武力”字样的白布小方块，缝于右襟，以“念念不忘为民众努力之要义。”^⑨

国民军联军的政治工作由总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政治部，则有刘伯坚主其事”^⑩。其下各军设立政治处，每师设有宣传员20人。当时政治工作干部很缺乏，刘伯坚曾加紧训练干部学校的学生使之充任，但仍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中共中央应冯玉祥和刘伯坚之请，先后从上海、北京、黄埔等地派遣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去国民军联军中作政治工作。为了指导政治工作的进行，中国共产党帮助冯玉祥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从此，国民军联军中的政治工作迅速而普遍地开展起来，部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风貌。正如周恩来所赞誉的：“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⑪

(二)

五原誓师壮大了全国革命统一战线，策应了南方的北伐战争，加速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1926年9月，北伐战争迅速推进到了武汉和江西境内，基本上击溃了吴佩孚军阀集团，但此时全国形势仍是敌我力量悬殊。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残部10余万人猬集河南，直系孙传芳拥兵20万控制东南五省，奉系张作霖拥兵35万盘踞东北、华北，还有山西阎锡山、陕西刘镇华地方军阀势力。此时，国民革命军方面不仅从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地位，而且正进入了北伐战争最重要的武昌战役、南昌战役的关键时期。武昌战役中，北伐军于9月3日、5日相继两次攻城受挫，伤亡枕籍，惨烈之极，“被迫转入了长期的有计划的包围。”^⑫江西战场上，北伐军“9月19日占领南昌，22日败退，一、六军损失及半。”^⑬中共中央认为“江西犹未攻下时，北伐军的前途尚在十分暗淡，不幸战而失败则不仅退出江西，即已得之湘、鄂恐均不守。”^⑭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的五原誓师，显然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五原誓师引起了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首先，它宣告了帝国主义和直奉等各派军阀“围剿南北二赤”的战略计划的彻底破产。被称为“北赤”的国民军不仅未消灭，而且由原来广州国民革命军的一支友军，进而正式参加了南方革命阵线；被称为“南北二赤”的国民军、国民革

命军不仅未消灭，而且已经联合起来从南方和西北方向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发动了夹击攻势。其次，它壮大了全国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军联军加入国民革命行列，其本身就壮大了革命统一战线阵营，同时使革命地区由珠江流域、长江流域扩展到黄河流域，从南方扩展到黑暗的北方，使北洋军阀反动政权的中心——北京受到了侧翼的威胁，这无疑对处于白色恐怖中的北方革命力量以巨大鼓舞，促进了北洋军阀联盟的动摇和分化，壮大了全国革命统一战线。

五原誓师在军事上更具有重要意义。国民军联军的崛起牵制了武汉北面的各军阀部队，并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它们之间的联盟，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1. 固甘援陕，击溃刘镇华镇嵩军，截断了吴佩孚的退路，加速了吴军残部的分化。国民军联军在西安解围战斗中，击败了号称10万之众的刘镇华镇嵩军，刘率残部逃往豫西。刘是吴佩孚扶植起来的军阀。本来败退河南的吴佩孚，在南、东、北受北伐军、奉军的包围，只有西面则是其可退之路。刘军败退陕西，无疑截断了他的退路，使集中河南一地的吴军处于四面被围的困境，粮饷军需极其困难，内部急剧分化，各将领自寻出路，如刘镇华接受冯玉祥委任的驻豫军总司令职，寇英杰、米振标分别接受奉系张作霖委任的安国军第十一方面军军团长、第十八军军长兼毅军总司令职，靳云鹗、任应岐、魏益三分别接受武汉方面委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兼鄂豫边防督办、第十二军军长、第三十军军长职。而且各派系之间冲突不已，发生火拼。这种分崩离析的吴军哪里还有反攻武汉的力量。另外，国民军联军雄踞陕西，锋逼中原，使吴佩孚感到灭顶之灾行将而至，曾数次召集军事会议，提出首先反攻潼关，对武汉则取防守之态的战略方针。此计划因其内部分化而未付诸实行，但却说明国民军联军吸引了吴军，使其有所顾虑而不敢对武汉国民革命军发起反攻。

2. 五原誓师对山西阎锡山是个直接的威胁，迫使阎锡山态度转化，对国民军联军采取亲善的态度，而对奉系军阀则取虚与委蛇的策略。五原誓师后，阎即派代表到包头见冯玉祥，请求消除南口战役中晋军攻打国民军的“误会”，并“从山西送来一万套服装、50万现款和许多枪弹。”^⑤随后在赵村设立国民军、晋军联合办事处，以保持密切联系。此时，阎锡山再也不敢一头栽进北洋军阀的怀抱。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请阎出任付总司令，阎未与就任，只是仍派代表常驻北京敷衍奉系，以观时局发展。

3. 牵制了奉系军阀，使其有所顾虑不敢轻易南下。国民军联军崛起西北，使奉系军阀受到侧翼威胁。当时中共中央就指出：“冯玉祥西北之再起——可以随时威吓奉军不敢疏南口之防，不敢存长驱南下而无顾忌的野心”，“他（注：指奉系张作霖）看得国民军在西北之发展较之北伐军之前进尤为重要”^⑥。因此，他在兵力部署上，“将第九军（15000人）派到了绥远地区。这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奉军，阻碍了南线行动的发展。”^⑦

4. 策应了北伐军武汉、江西战场。国民军联军牵制了武汉以北北洋军阀部队的这个新形势，一则使北洋军阀未能立即反攻武汉，这样就使武昌被围的吴佩孚军队希望断绝，军心动摇，北伐军遂于10月10日夺取武昌；二则使武汉战场上的北伐军减轻后顾之忧，得以抽调第四军、第八军东下援赣，江西战场始有转机，并于11月8日攻占南昌。历经两月的江西战争“迭遭失败，设后来无四军、八军之出动，至全部溃灭。”^⑧

这些说明了五原誓师后崛起西北的国民军联军在政治军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当时中共中央指出：冯军能在北方存在，“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持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为未来对奉的北伐战争说，若没国民军之骑兵和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国民军在中国国民革命中将占着极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对于西北工作

当十分重视。”^②

(三)

五原誓师开创了西北地区国共合作的革命局面，促进了西北地区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涨。

国民军联军五原誓师后固甘援陕的胜利，使陕、甘、绥连成一片，重新纳入了国民军联军的势力范围，为群众革命运动创造了军事上安定的有利环境。又由于国民军联军的革命化，使西北地区充满了浓厚的革命气氛。这样，国民军联军革命化与西北群众斗争在时间上的一致和空间上的同一，为西北群众革命运动高涨提供了可能，而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领导则使这一可能变成了现实。因此，五原誓师后随着国民军联军的推进，广大西北地区特别是陕西省迅速出现了群众革命运动高涨的局面。

在热河、绥远均有数量不等的农民协会组织。在甘肃出现了群众革命运动。五原誓师前，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贾宗周等在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下来到兰州，帮助建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并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整顿国民党甘肃省临时党部，开辟了革命工作的基础。当五原誓师的消息传来后，“当时的西北，却因此激起了革命的潮头，潮头冲击着西北的城市，于是乎兰州沸腾了。”^③甘肃共产党组织利用这大好形势，积极宣传、组织群众。在兰州建立“少年同志会”，举办民众夜校，以各种名义主办《革命青年》、《民声》、《妇女之声》等革命刊物；在兰州挑水、理发行业工人中建立了工会组织；在兰州市的七里河、西固和皋兰县等地组织建立了10余处农民协会，进行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在兰州成立了以共产党员王孝锡为社长、马梁山为书记的青年社。这些促进了甘肃工、农、青、妇等群众革命运动的兴起。同时，随大军援陕途中到达甘肃平凉的刘伯坚等共产党人，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接办《平凉日报》，组织“新文化剧团”，举办政治训练班，建立工人组织，使平凉地区也兴起革命浪潮。

在陕西则出现了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国民军联军入主陕西后，西安遂成为北方“中国革命的中心；当时流传着‘南广州，北西安’的说法”，“与此同时，陕西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合适场所。几乎全省的一切活动领域，在政府机构，在教育部门和群众组织等等，中国共产党人很快都占据了重要岗位。”^④陕西共产党组织迅速发展，至1927年5月，党员达2147人，建立了党组织的县有37个，市1个，镇17个^⑤，形成了群众革命运动的强大领导力量。1927年1月正式成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共产党员赵宝华、刘含初当选为常务委员，魏野畴、李子州、张秉仁、张含辉、吴碧云分别担任宣传、组织、青年、农民、妇女各部部长。至5月底，全省国民党员约23000人，国民党的工作“几乎完全在我们包办的形式中”^⑥。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这是一个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政权组织，于右任、邓宝珊为正、付总司令，共产党员魏野畴、史可轩、杨明轩、葛霁云、杨晓初、王尚德分别担任政治部付部长、政治保卫部部长、教育厅长、民政厅付厅长、财经委员会付主任、出版局长等要职。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通过这个统一战线的政权组织，积极整顿吏治、革新司法、创办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培训骨干、普及宣传教育等，开创了陕西革命的新局面，出现了群众大革命的高潮。至1927年5月底，全省已成立县级农协组织51个，农协正式会员37万余人，加上正在筹备而未正式成立组织的成员共70万人，其中武装农民在10万以上。5月30日成立了以共产党员王授金为主席的陕西省农协。几千年来处于水深火热的陕西农民昂头挺胸，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向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冲击，在三秦大地上掀起

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大革命。同时，工会、青年社、妇女协进会、商会、儿童团组织尤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革命浪潮冲击着社会各个领域。

偏僻的西北，特别是陕西的群众革命运动，对全国大革命形势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北伐战争时期黑暗的中国北方的异军突起，不仅在北方革命中当推首位，而且堪与两湖革命相媲美。它与武汉地区革命斗争遥相呼应，壮大了全国革命声势。另外，在这次群众革命运动中，广大西北人民经受空前的革命洗礼，受到了有组织的革命斗争锻炼，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及陕甘边区开创北方唯一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这些都是与五原誓师国民军联军崛起西北有密切联系。

综上所述，五原誓师对国民军、对全国革命统一战线和北伐战争、对西北群众革命都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但应强调的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国民党人的努力下，只有在苏联的援助和广大西北人民的支援下，才有五原誓师及国民军的崛起。五原誓师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体现。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对五原誓师的历史意义予以探讨和充分肯定。

注释：

① 《刘汝明回忆录》，第72页。

② 简又文：《西北从军记》，第42页。

③⑤⑩⑫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第486、443、481、505页。

④ 简又文：《冯玉祥传》，第250页。

⑥⑨⑪ 《冯玉祥日记》，卷7，第9—10、31—35、36页。

⑦⑪⑭⑮⑯⑰ 《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选辑》(1922—1926)，第103、104、93、96、107、104—105页。

⑧ 《冯玉祥大帅关于中国局势的谈话》，1926年8月19日。载《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獻资料选编》第1辑，第212—213页。

⑫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68页。

⑬ 《向导》，第177期，第1835—1837页。

⑭ 转引自《国民军革命史初稿》下册，第442页。

⑮⑯⑰ 《冯玉祥军事要电汇编》第四编，卷17，第1、5—6、6—7页。

⑱ 《国民军革命史初稿》，第449—450页。

⑳ 周恩来：《寿 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载1941年11月14日《新华日报》。

㉑ [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454页。

㉒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页。

㉓⑳ 宣侠父：《西北远征记》第126、128页。

㉔ [苏]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第242页。

㉕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154页。

㉖㉗ 1927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扩大会议的党务报告》。